

豫賸兵法研究

內蒙古大學中文系

目 录

《孙臆兵法》评论

论孙臆.....	(1)
《孙臆兵法》中的备战思想.....	(16)
孙臆“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军事思想.....	(21)
孙臆论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	(26)
孙臆的全局观点.....	(31)
谈“穷兵者亡”.....	(35)
从“相为变”看孙臆朴素的军事辩证法	
——读《积疏》篇.....	(41)
朴素军事辩证法的具体体现	
——读《奇正》篇.....	(45)
孙臆军事思想的具体运用	
——简评“围魏救赵”之战.....	(50)
评“知道”.....	(54)
关于“兵”与“法”.....	(58)
评“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61)

评《见威王》…………… (64)

孙臆论地形

——读《地葆》篇…………… (67)

浅谈孙臆对城邑攻取问题的论述…………… (70)

读《将败》…………… (74)

《孙臆兵法》原文、注释及译文

上编…………… (79)

下编…………… (143)

论 孙 臆

《孙臆兵法》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军事学著作。它总结春秋战国以来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军事思想，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兵书”。

今天，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教导，对这部失传一千七百多年的宝贵文化典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对于研究战国时期阶级斗争的历史和古代的军事思想，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服务，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孙臆及其生活年代

孙臆，是孙武的后代，约与商鞅、孟轲同时期，曾任齐国“大夫”之职。他的主要生活年代为公元前三八〇年到前三二〇年左右，主要活动地方在齐国，主要功绩是从军事上辅助齐威王进行统一中国的事业。在孙臆一生的军事实践中，著名的有“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孙臆亦由此而“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孙臧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是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要求统一中国，各国的统治者互相争夺和奴隶主阶级拚命维持分裂割据状态的时代。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孙臧坚定地从巩固齐国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和实现封建统一的实际需要出发，批判了所谓“仁义”“礼乐”，提出了“举兵绳之”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孙臧在当时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了战争对巩固和扩大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后提出来的。它充分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它在新兴地主阶级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起着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孙臧的军事思想

《孙臧兵法》无论从广度和深度，都丰富和发展了孙武等早期兵家的军事思想。其中有对战争的作用，胜负的因素，强弱的转化，地形的选择，兵力的部署，阵法的运用，将帅的条件等许多精辟的论述，内容相当丰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孙臧的军事思想，是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社会

政治大变革，各种形式的战争日趋激烈复杂的产物。铁器的运用和推广，各国地主阶级统治者的互相兼并以及兵器的改进，兵额的急增和多兵种的出现，无一不是孙臧军事思想形成和逐渐趋向成熟的客观基础。下面，我们仅就其战争态度、军事辩证法以及地形、攻城、阵法、将帅等问题加以分析研究。

一、鲜明的战争态度。孙臧主张以兵“禁争夺”，又反对乐兵好战，而“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是他鲜明的战争态度。“举兵绳之”，就是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孙臧初见齐威王时，就比较集中地陈述了自己的战争观。他首先指出：“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命运。这个观点早在孙武的时候，就已经说了的，一百多年之后，孙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强调它，是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的。他认为，只有采取战争的手段，才能使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强”起来，“立”得住；才能使“天下服”，真正实现封建统一的政治理想。在论述战争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同时，孙臧进一步谈到怎样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问题。他说：“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乐兵者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孙臧反对乐兵好战，谁盲目“乐兵”，谁就必然灭亡，绝不能取得胜利。他主张“事备而后动”，这和孙武所论述

过的慎战思想“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是息息相通的，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物质与精神的准备情况如何。如果说，“战胜而强立”是新兴地主阶级的目的，那么，“事备而后动”则是直接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手段。

“举兵绳之”的思想，是和以“仁义”去战的说教完全对立的。孙臆在向齐威王陈述自己对战争的看法时，以战斗的姿态，对这种反动说教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列举“神戎战斧遂”、“黄帝战涿鹿”、“尧伐共公”、“武王伐纣”等七个历史传说，揭露即使是孔孟之徒所极力推崇的“五帝”、“三王”、“周公旦”，也没有一个不是依靠武力取得天下的；所谓“积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只不过是谁也办不到的骗人鬼话。列宁指出：“在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毛主席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在春秋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解决不了的政治问题，没有一个不是用军事斗争解决的。任何“仁义”、“礼乐”都无济于事，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所以，孙臆“举兵绳之”的战争观，是完全符合于当时的客观现实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统一中国愿望的反映。

二、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毛主席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古代的辩证法，在军事领域是表现得特别生动，运用得最有力量，理论上也论述得较明确透彻的，这是由于军事实践的客观灵活性及机动性所决定的。在这方面，《孙臬兵法》也是很突出的。

关于军事上“形”与“名”的关系，孙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形定则有名”。他指出：“战者，以形相胜者也”，这就是说，战争就是以有形的力量相敌而取胜的。他又说，“夫兵者，非士恒势也”，这种以形相胜的情况又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以一形之胜胜万形，不可”，只有“以万形之胜胜万形”，才能“其胜不屈”。这种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研究战争的各种条件和因素的观点，不仅合乎唯物主义哲学的标准，而且也是对靠什么“仁政”、“王道”就能够“无敌于天下”的唯心主义胡说的一个彻底的否定。

《奇正》和《积疏》是整个《孙臬兵法》的哲学基础。在这两篇著作中，孙臬从哲学的高度，对战争中的矛盾和这些矛盾的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关系作了甚为详尽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矛盾对立的范畴：敌我、主客、攻守、进退、众寡、强弱、奇正、积疏、盈虚、徐疾、径行、动静、逸劳、险易、治乱、

生死、胜败，等等；初步认识到了事物具有二重性。并且进一步明确指出：“积疏相为变，盈虚相为变，径行相为变，疾徐相为变，众寡相为变，逸劳相为变”，这就认识到了事物的矛盾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关系。奇和正、积和疏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对全书许多出色的战术问题都概括了。象这样的军事哲学和军事辩证法专著在古代兵法中实是少见的。

毛主席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取决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有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相为变”，关键就在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造势”，创造促成事物转化的条件。孙臆指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尽管他所说的“人”，并不包括一般劳动人民和普通的士卒，而主要是指新兴地主阶级，这是由其剥削阶级的偏见所决定的；但是，在两千多年前，他比荀子更早地能从世界万物中看到人的因素的重要性，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正是一个“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唯物观点。

怎样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有利的作战

势态？他认为战争的指导者必须充分了解客观的情况。在回答田忌提出的什么是“兵之急者”的问题时，孙臆强调首先是要全面掌握情况：“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否则，就不是一个明智的将军，而是一个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他对将帅指挥作战提出了要知天时、地理、民心、阵法、道路的险阻和远近等六种情况的严格要求，体现了主观指导要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规律。他朴素地把对战争胜败的判断和指挥作战的决心、办法建立在对客观情况取得了“知”的基础上，这是符合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他认为打仗必须“能见祸福于未形”，要“有功于未战之前”。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不仅比较深刻地揭示了战争有它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反动的“知天命”的唯心主义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是对“死生有命”的“天命论”的一个有力的批判。从这一原则出发，孙臆对将帅提出了许多严格的要求，在将帅条件方面，他着重以合于封建道德标准的“义”、“仁”、“德”、“信”、“智”等五个条件作为将帅必须具备的品质，并列举了“令不行，众不一”、“下不服、众不为用”、“民苦其师”、“兵遁”、“众苦”、“众劳”、“众恐”、“众偷”、“众怠”、“众疑”等多种必然打败仗的原因规戒将帅，在《将败》中他又集中了将帅近二十种弱点，指出“多败者多失”作为

将帅之大防。这些都是在于使将帅能够为新兴地主阶级实现封建统一而努力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其它如严格“篡卒”，注意“延气”，认真“赏罚”，也无一不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和其政治目的服务的。特别是孙臆“立官则以身宜”的选将标准，更是反对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制度，为新兴地主阶级争夺军权，以及“任人唯贤”的直接体现。从《孙臆兵法》中反映出的这些思想来看，可以说孙臆在军事问题上比较重视了主客观之间的辩证关系。

“众寡相为变”，是孙臆在其整部兵法中论述最典型最突出的军事辩证思想。孙臆认为，寡可以敌众，弱可以胜强。“寡”和“众”，“弱”和“强”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为了促使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向其对立面转化，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将帅提出了对众敌、强敌、凭险固守之敌，采取不同战略战术的要求。对众敌，要“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使敌“分离而不相救”，“受敌而不相知”，直到敌人“沟深垒高不得以为固，车坚兵利不得以为威，士有勇力而不得以为强”的时候，我则“并卒而击之”，集中优势兵力，象收拢五指的拳头一样打击在敌人局部的“寡”上，然后，再一拳一拳把消灭敌人总体上的“众”，这就是“以寡敌众”的战法。对强敌，要先

“让威”、“佯北”、“避而骄之”、“以骄其意，以惰其志”，使敌人不识我的真假虚实。尔后，抓住战机，“攻其不御，压其骀，攻其疑”，打击已经从思想上解除了武装，从“威”且“武”的优势转化为“骄”且“懈”的劣势的敌人，这又是“以弱敌强”的战法。对凭险固守之敌，要“使离其固”，我则“以揆其虑，施伏设援”，在敌人“卷甲趋远，倍道兼行，倦病而不得息，饥渴而不得食”的情势下，我“攻其所必救”、“击其移庶”，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没有不取得胜利的。孙臆这种充满辩证法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体现了战国中期战争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实际上对“不鼓不成列”的蠢猪式战法和其“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的形而上学的谬论，是一个有力批判。较之孙武“因敌变化而取胜”，“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的军事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孙臆“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等辩证法思想，在桂陵之战中得到了生动的运用。这次著名战役的胜利，不仅是孙臆亲自指挥的功绩，而且也是孙臆军事思想具体实践的范例。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曾经肯定了这一战法，并把它作为反围攻作战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地形、攻城、阵法等作战条件和作战方法的灵活运用。孙臆从他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出发，在《地葆》篇和其它各篇中，精辟地论述了地形与军事的关系，得出了“患兵者地”、“困敌者险”的科学结论。作战必须“下知地之理”。他指出：“凡地之道，……直者为纲，术者为纪。纪纲则得，阵乃不惑”。这就是说，要摆正大路（纲）和小路（纪）的关系，“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根据不同的地形，配置不同的兵力、兵器，有效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在地形问题上，孙臆还强调夺取有利地形，“九夺”中有五夺就是“取水”、“取津”、“取途”、“取险”、“取易”，这是孙臆的敢于胜利的精神在军事斗争中的积极反映。

孙臆比其前代军事家重视了城邑的攻取。他把处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城邑区分为易攻的“牝城”和难攻的“雄城”，认为“牝城”可击，“雄城”不可攻取。当然，从现代战争的观点看来，这种区分是原始、粗浅、不科学的，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著作中，象孙臆这样专讲攻城问题的，还比较少见。孙臆重视城邑攻取的思想，不仅是战国时期“千丈之城，万家之邑”成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和战争争夺的重点以及攻城条件的不断成熟的具体反映，而且也是对孙武认为攻城是“不得已”的下策，主要靠

在野战中消灭敌人、解决战斗的思想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发展。

由于战国中期战争地域的逐步扩大，在车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骑兵和弩兵的日益增加，不仅战场地形更加复杂化，阵法的运用，也比春秋时期和战国前期有了很大发展。孙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战争的实际需要，在阵法的运用方面，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方”、“圆”、“疏”、“数”、“锥行”、“雁行”、“钩行”、“玄襄”、“火”、“水”等十种阵法的各自特点和运用，并强调阵势要象剑一样“有锋有后”，以便互相配合，“相信不动”，“破强敌”，“取猛将”。

四、不可避免的历史和时代局限性。孙臆虽然是战国中期最杰出的军事家，但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仍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剥削阶级的偏见和局限性。

首先，在战争观上，孙臆虽然主张“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认清战争的阶级本质，仅仅为新兴地主阶级进行战争、统一中国提供了一个理论武器，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战争的根源和消灭战争的根本途径。

在历史观上，尽管孙臆比荀子更早地提出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可贵认识，但他看不到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实行的是“兵有五恭五

暴”的愚民政策，他讲的“严、威”和“赏、罚”，也主要是统治士兵的手段，无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他反复强调夸大的是“王者之将”的个人作用，始终没有越出将帅决定一切的英雄史观的范畴。

孙臆的军事辩证法也不彻底。在地形的论述上，把“东注之水”说成是“生水”，把“北注之水”说成是“死水”，把“南阵之山”，说成是“生山”，把“东阵之山”，说成是“死山”；在攻城问题上，光是按地形条件把攻击的城邑分为“雄城”和“牝城”两种，并断言“雄城”“不可击”。这里不仅包含了其剥削阶级“男尊女卑”的反动思想意识，而区分也极幼稚。所有这些，都是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否认了事物互相转化的可能性，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他所讲的“形”、“名”说和“相为变”的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又如在《地葆》篇中讲的“五壤相胜”：“青胜黄，黄胜黑，黑胜朱，朱胜白，白胜青”，这完全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另一种格式，带有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这一点，他不如孙武。《孙子兵法》中也讲过“五行”的观念，但他讲的“五行无常胜”，还是有点科学精神的。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孙臆兵法》时应当剔除的糟粕。

研究《孙臆兵法》的现实意义

从《孙臆兵法》的整个内容看，基本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为新兴地主阶级巩固政权，推行封建统一战争提供了理论武器，尽管其中有一定的时代和历史局限性，仍不失为先秦军事著作中的一部代表作品。研究《孙臆兵法》，对于我们加深理解毛主席的伟大军事思想，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服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中，不仅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也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毛主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提出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战术，它不仅是我军在过去的革命战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也必然是我军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法宝。无论从其军事的理论和实践，内容的广度和深度看，都是马克思主义在军事科学上的光辉发展的结晶。

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为其反党夺权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苦心炮制了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其中大谈什么“四

快一慢”，“三种情况三种打法”、“三猛战术”、

“四组一队”和“三三制”等，并无耻地把这套完全违背战争规律和唯物辩证法的所谓“战术原则”，吹嘘为“打胜仗”的“原则”，甚至把自己扮成“常胜将军”，“天才军事家”，真是狂妄到了极点。我们知道，战争本身是生动的，发展的，千变万化的，他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其实是唯心主义和机械论在战争问题上的反映，他也并不是什么“常胜将军”，“天才军事家”，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常败将军”，不会打仗的蠢才。

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虽然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两霸争夺世界霸权的丑剧愈演愈烈，但是，第三世界团结反霸的力量也愈来愈大，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形势正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反霸斗争，而不利于美帝、苏修两霸争夺世界霸权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我们决不能丝毫放松革命的警惕性，特别要密切注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随时准备反击这个超级大国对我国的武装干涉和突然袭击。长期以来，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妄图步老沙皇的后尘，把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这是